

# 福音书文本生产的动态分析\*

## A Dynamic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on of Gospel Texts

侯春林

HOU Chunlin

### 作者简介

侯春林，河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HOU Chunl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Email: houchunlin2012@163.com

## Abstract

The Gospel was never a ready-made text, but was formed through an extremely complex, dynamic process, with stages of writing, canonization, copying and revising. In light of the western Marxist theory of Textual Producti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Gospel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 of production mechanism: manual duplication and mechanical duplic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whether by manual reproduction or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he Gospel has been adulterated with a variety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ext generation, and subtle changes in the text have exerted a particular ideological effect in history. The confront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ideologies led to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eological disputes, which were importan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shaping of early Christianity, and are vividly seen in the early dynamic formation of the Gospel texts.

**Keywords:** Gospel, text production theory, ideology, canonization,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text

圣经有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对文本生产过程的探究应当是圣经阐释的首要环节，能够直接发掘出意识形态在圣经文本生产过程中的渗透，从而有效地减免各种后来因素对文本含义的干扰和侵蚀。下面首先对文本生产理论的适用性进行论证，然后借助这一理论工具揭示福音书文本的动态生成机制。

## 一、文本生产理论对福音书文本的适用性论证

“生产”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逻辑链条，使得精神文化亦被认为具有生产的属性，从而“文化生产”成为马克思进行上层建筑批判的重要武器。“文化生产”具有的生长性和开放性意涵为福音书文本阐释提供了巨大空间。

### 1. 生产性是艺术创作的先天特征

文学生产的理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而从生产的角度对艺术进行清晰界定的是马克思，他提到：“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sup>①</sup>从马克思对文学生产的叙述来看，文学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并非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特有产物，而是在人类文明早期便已存在。<sup>②</sup>

---

\*本文是中国博士后第66批资助项目“圣经经济思想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河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计划资助项目（2019CXTD00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CZX020）的阶段成果。[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following funds: The 66th Post-doctoral Research Fund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Ideas in the Bible and Its Mechan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Team Cultivation Program of Henan University (Project No.: 2019CXTD006);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 of Henan Province (Project No: 2017CZX020).]

<sup>①</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Karl Marx,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manuscript of 1844,”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267.]

<sup>②</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13页。[Karl Marx, “Introduction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arx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113.]

即便古代和现代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最基本的文学生产机制依然是相通的——都表述了意义生成机制所具有的社会效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分别从政治经济学、哲学两个层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前者以本雅明、布莱希特为代表，后者以阿尔都塞、马歇雷、伊格尔顿为代表。其中，从哲学层面继承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并进行范式转换的代表是马歇雷和伊格尔顿。马歇雷提出文学以意识形态为原料进行生产，而文学和意识形态之间呈现为一种“离心”结构，这种结构使得文学文本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具有诸多的“症候”。在马歇雷看来，“意识形态以其意味深长的沉默、巨大的空隙和形式出现在文本中”<sup>①</sup>。意识形态在文本中造成的“症候”是作者的“无意识”行为，是作者受其所处社会位置的意识形态局限造成的结果，作者本人实际上无法意识到自身的意识形态策略。

伊格尔顿继承了马歇雷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看法，并提出“美学意识形态”的概念。据其所论，美学意识形态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美学”，只是裹上了美学“外衣”（形式）的意识形态。易言之，美学是为意识形态而服务的，伊格尔顿真正寻求的是一种“形式的政治”。据此看来，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依然没有逃逸出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架构，且他试图解决的仍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或机械反映论的老问题，他从审美出发又回到审美，目的并非挖掘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是要探寻现实冲突在文本中的消解。

## 2. 福音书文本的动态生成过程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逻辑核心在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以一般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而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则是确认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无意识性。<sup>②</sup>不过，意识形态既可能是一种“政治无意

<sup>①</sup> 伊格尔顿：《马歇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戴侃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37页。[Terry Eagleton, “Macherey an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rans. DAI Kan, *Social Sciences Abroad*, no. 1(1983): 37.]

<sup>②</sup> 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ZHANG Yibing, *Wen ti shi, zheng hou yue du yu yi shi xing ta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Press, 2003), 144.]

识”，也不能完全排除“政治有意识”的可能性。进一步讲，政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作者的政治意识必然是有意识的。正如马歇雷所说：“为了说出一些事情，必须隐藏另一些事情。”<sup>①</sup>而无论是“说出”还是“隐藏”，都并不必然排斥作者意识形态的在场。

就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而言，笔者认为，意识形态是用以凝聚和延续某一社会共同体的思想工具，通常表现为“图标”“象征符号”“口号标语”等外在传播形式，亦有以口传或书面文本形式流传的一整套叙事内容，其中包括共同体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意识形态既有针对共同体内部和针对其他共同体的空间维度，也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当共同体遭到危机时，意识形态能够极大地提高共同体成员的向心力，当危机过于严重时，个别成员亦有可能在既有意识形态传统中阐释出新的意识形态内容，甚至分化和衍生出新的共同体；新共同体与原共同体在共享意识形态传统的同时，势必酝酿并形成另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由此观之，福音书的生成过程也是意识形态发挥社会功能的过程。对于福音书的生产来说，需要区分文本写作过程、正典化过程、传抄修订过程，这三个过程都具有生产性。文本的生产过程是出于有意识的集体运作，其中涉及多个利益群体和复杂环节，形成了独特的文本生产机制：包括生产者（包括福音书作者、抄写者、编者、译者）、生产技术（从手工复制到机械复制）、传播方式（从口头传播到书面传播）、消费者（识字程度不等的受众）等各项必要因素。

在福音书中，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是兼而有之的。福音书写作的初衷更多地是对口述时期耶稣言行的记录，最早成书的《马可福音》其实是对一堆现成素材的整理和汇编，其历史性大于意识形态性。然而，随着福音书文本的动态变化，其意识形态性逐渐占据上风。福音书从一开始就与纪元初期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而且四部福音书无一例外都经

---

<sup>①</sup> 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95.

历了传抄和修改的过程，这一过程与消费社会中的文学生产机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确切地说，福音书文本生产过程对文本的改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神学、性别、异教徒和犹太人等）互相博弈的结果。<sup>①</sup>《马可福音》及之后其它几部福音书掺杂入了作者各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因素，并形成了四福音书内部特有的“间性”现象。<sup>②</sup>

对福音书文本生产的考察，不仅应当关注基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状况，还应当将不可控的外力因素、初期教会的人员构成、耶稣运动的人性魅力对群众社会心理的吸引（“卡里斯玛”）等多种因素都考虑在内。此外，还有必要区分耶稣、福音书作者、抄写员、教会领袖等不同主体在文本生产中承担的不同职能。笔者认为，福音书生产者试图通过文本来消解性别、种族、阶级等边缘化群体的社会矛盾，并在各种神学论争中凸显耶稣的神性与人性、文本的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关系的复调本质，<sup>③</sup>为从文本生产的角度研究福音书提供了合理性和阐释空间。随着早期教会处世策略的调整，对福音书进行属灵化处理以消解社会冲突的趋势逐渐明朗。福音书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大瘟疫、耶路撒冷覆灭等事件的表述或是空白、或是暧昧不清，对耶稣的传道和事迹则多采用隐喻和超自然的叙述方式，而相比之下对于神性主题的抒发却重彩浓墨。从《马可福音》到《约翰福音》，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性逐渐淡化，神性色彩逐渐浓重。

对于此类文本现象，马克思主义圣经学者贝罗（Fernando Belo）的看法不无道理：在罗马帝国的高压统治下，早期基督教会面临严峻的

<sup>①</sup> 参见伊格尔顿：《耶稣基督：福音书导论》，赵文琼译，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10年春，第77页。[Terry Eagleton, “Introduction to Jesus Christ: The Gospels,” trans. ZHAO Wenqio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23(2010):77.]

<sup>②</sup> Fernando Belo, *A Materialist Reading of the Gospel of Mark*,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Maryknoll: Orbis, 1981), 67.

<sup>③</sup> 有关耶稣形象以及圣经文本复调性的讨论，可参Walter L. Reed, *Dialogues of the Wor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Bakh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④</sup> Ibid., 32-33.

生存危机，将自身进行属灵化解释未必不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sup>①</sup>但是，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并不足够成功，因为神性和人性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在文本中经常会给作为接受者的会众造成“阅读阻碍”。福音书阐释的任务正是透过历史的烟尘，对文本的原初含义进行尽可能接近真实的还原，其目的并非还原历史，而是有益于诠释历史。一如埃尔曼（Bart D. Ehrman）所说：“追溯蓄意修改的部分可谓关系重大，并不是因为这能保证我们了解到原始作者想说什么，而是可以呈现作者的文本经过抄写者的复制可以诠释出什么。”<sup>②</sup>

### 3.福音书文本有效规避了文学生产理论的固有缺陷

文学不仅是一种审美形式，还具有不可言说的内在诗性。文学生产理论是把利刃，但诗性因素的存在恰恰能够轻易地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不过，福音书文本刚好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一问题。整体来说，圣经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相对于诗性因素是占上风的，原因在于，福音书作者无意借圣经来表达个人审美，他们叙述的主题皆是国家大计、生民疾苦，当然更重要的是神人之际。再加上福音书还有一个动态生产的过程，意识形态因素最大限度地压缩或利用了其中的诗性因素<sup>③</sup>，从而清理出了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文本战场。

除此之外，作者问题和生产流程问题是文学生产理论存在的两个缺陷。作者的主体性、神秘性在伊格尔顿和马歇雷那里被贬低为一个符号，变成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甚至作者本身竟沦为“被放逐的主体”。与之相比，作品的地位被大大提高：“实际上是作品在生产自

<sup>①</sup> Fernando Belo, *A Materialist Reading of the Gospel of Mark*,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Maryknoll: Orbis, 1981), 83.

<sup>②</sup> 巴特·埃尔曼：《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黄恩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53页。[Bart D. Ehrman, *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trans. HUANG Enli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153.]

<sup>③</sup> 意识形态既可能压缩纯粹审美的诗性因素，又可能利用诗性的媒介进行传达，甚至“意识形态会作用于叙事使之成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服务，从而使得叙事本身再次被意识形态化。”参见Tina Pippin, “Ideology, Ideological Criticism, and the Bible,” *Currents in Research*, no. 4 (1996): 63.

己”，而“批评的职能在于发现每部作品中这种自我生产的规律。”<sup>①</sup>

不过，对于福音书来说，其作者恰恰连“被放逐”都不需要，而是本来便以符号状态存在着，从一开始便丧失了作为作者的主体权利。直到18、19世纪的来源批评和编修批评者那里，福音书的“作者身份”才引起真正重视。<sup>②</sup>可以推测，目前我们看到的福音书最初可能经历了复杂的文本生成过程，其中蕴含了口传时期的民间素材和传闻故事，文本之内还存留着生产者加工改造的痕迹，但通常意义上的作者身份早已湮没无闻了。在成书之后，福音书作者的位置显得更加不重要：“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是历史人物，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所写的文本哪些是与他们有关联的。总的来说，他们的所为是含糊可疑的。”<sup>③</sup>据学者考证，福音书的“四源”不仅与当时几个大教会直接相关，而且还是福音书正典化过程中的主要原因。<sup>④</sup>确切地说，那些进入正典视野的材料第一目的即满足当时教会及信徒的信仰生活，在此意义上，来源批评和编修批评所做的努力或许终将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伟业”。

当然，说整个福音书生成过程完全是意识形态化的并不符合实际，笔者亦无此意。譬如说在福音书正典化过程中，一方面，教会大会在树立正典福音书标准方面确实有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需考虑到那些正典在教会大会之前实际上已经被当作权威性经典在使用。启蒙之后，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引发的福音书拆解分析使之不再仅是神圣启示的符号，也具有了历史性，<sup>⑤</sup>因而成为开启近现代圣经学研究的重要关口，居功至伟。本文所图，无非是想借由意识形态批

<sup>①</sup> 伊格尔顿：《马歇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第37页。

<sup>②</sup> Steven L. Mckenzie and Stephen R. Haynes, eds., *To Each its Own Meaning*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9), 35-37.

<sup>③</sup> 伊格尔顿：《耶稣基督：福音书导论》，第77页

<sup>④</sup> 《马可福音》代表罗马教会传统，M（马太）和Q代表耶路撒冷教会传统，L（路加）代表该撒利亚教会传统；此外，第四部福音书《约翰福音》亦不例外，代表以弗所教会传统；参见刘光耀：《四福音书解读》，第31-32页。

<sup>⑤</sup> 正如福音派学者的观点，福音书一方面是“神的话”，另一方面也带有历史印记和文学特性。整体观之，圣经的历史批判一开始虽是以革命姿态出现在圣经学研究领



评视角揭示曾经参与了福音书文本生成过程的某些意识形态因素。因为，或许更为妥当的看法是，意识形态在福音书生成过程中未必发挥决定性作用，却势必发挥作用。

与一般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福音书不但没有在消费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被解构或降格，恰恰相反，福音书被消费和再生产的过程对应的既有其获取正典资格的正典化过程，也有其被传抄、接受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壮大，沟通了人言与圣言的障碍，使原本散乱无序的文献汇集通过整理、修订、翻译、解释等生产加工程序，成为一部权威的神圣经典。从文本生产的特定视角审视圣经，与其说是在对圣经进行去魅，不如说是在再现圣经“魅化”的过程。

## 二、手工复制时代的文本变动

纪元初期的罗马帝国处于不断扩张和加强政治控制的阶段。众所周知，犹太人和罗马人对耶稣运动关注的重点其实大相径庭。只要耶稣运动的影响范围局囿于精神信仰层面，拥有广袤版图的罗马帝国就不会对这个弹丸之地的边缘化教派产生任何兴趣。如此一来，各方在遵守底线的前提下一度维持着脆弱的默契。

在此背景下开展的耶稣运动无疑具有现世革新的指向，割裂“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做法是对之最大的误解。<sup>①</sup>准确地说，耶稣运动从一开始就兼有属灵和属世两种指向，只是随着外部形势的恶

---

域，受到传统教会神学打压，但时移世易，神学家们后来发现他们同样可以利用历史批判方法实现自身的神学意图，便也转而热情地投身其中。这也从侧面说明，意识形态性贯穿福音书生成始终，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关键性的。

<sup>①</sup> 赵敦华认为，奥古斯丁所说的“城”（*civitas*）“兼有社会和国家的意，又等同于‘人民’”，其政治主张既是净化和壮大上帝之城，又是地上的社会与国家间的和平有序。可参赵敦华：《上帝之城里的哲学》，载《基督教文化学刊》第23辑，2010年春，第107页。[ZHAO Dunhua, “Philosophy in *The City of Go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23(2010):107.]

化，组织者灵活调整了处世策略，<sup>①</sup>不仅在耶稣的神人二性问题上对自身教义体系进行了对话式的解释，以塑造自身无害而有益的社会形象，还有意淡化和遮蔽早期耶稣运动的现世反抗属性，以积极地向罗马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从而由一个犹太教内部的小教派成功转型为帝国国教。<sup>②</sup>初期教会调整和适应自身策略的动态过程既是组织者为了适应外部环境有意为之的结果，又不得受制于客观生产条件而呈现出某些具体特征。从福音书文字的具体变化中可以对这一过程进行生动的说明。

概括来说，公元2到4世纪的早期基督教会对于耶稣神性和人性的代表性观点有：耶稣是人不是神的嗣子说；耶稣不是人是神的幻影说；耶稣是人又是神但神人二性分离的诺斯替主义，<sup>③</sup>以及大公教会正统派的基督论。由于纪元初期存在众多的早期基督教著作，因此论辩双方各自引经据典以壮声势，而在决定哪种引文更有说服力时存在两个判断标准：<sup>④</sup>第一个标准可称为作者原则，即旧约作者必须是先知，福音书作者必须是直接或间接领受过耶稣教训的人，可见“真实”反

---

<sup>①</sup> 王学晟运用框架整合的社会学理论，考察了耶稣运动后期从小教派到大教会的转变，指出耶稣运动的策略调整既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也减少了与周围社会环境的摩擦。参王学晟：《从小教派到大教会的转变：耶稣运动的框架整合》，载《圣经文学研究》2017年春，第48-64页。[WANG Xuesheng Nathanael, "From Sect to Church: The Frame Aligenment of Jesus Movemen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14(2017): 48-64.]

<sup>②</sup> 杜兰认为教会制与君主制的类似是基督教成为国教的重要原因，参见威尔·杜兰：《凯撒与基督》，载《世界文明史》（第三卷），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487页。[Will Durant, "Caesar and Christ," in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 3, trans. Taiwan Lion Culture Company (Beijing: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487.]

<sup>③</sup> 此处的“诺斯替主义”主要指公元4世纪的聂斯托利主义一派，而诺斯替主义整体上对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统一观点，有些持幻影说，有些持嗣子说。

<sup>④</sup> Leslie Howsam and Scott McLaren, "Producing the Tex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r Editions of the Bible,"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s.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62.

映耶稣本意仍是论战的最有力武器；第二个标准可称为读者原则，意味着那些拥有更多追随者的基督教团体在论辩中占据更大优势。文本生产过程在这些不同神学派别的争论中逐步进行，持守某种神学观点的基督教团体为了赢得辩论，不惜改动福音书文本使之符合自身观点。最终的结果是，公元449年罗马主教利奥引入神圣位格（divine person）的概念，认为神性和人性在道成肉身的过程中结合于基督的位格之中，修正了基督二重本性论，奠定了古典基督论的基础。<sup>①</sup>

若以时间顺序来看同观福音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使用了最早成书的《马可福音》的材料，而《马可福音》成型之前，还存在着口传时期的不同版本。不同文献来源毫不奇怪地形成了多处文本症候。<sup>②</sup>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sup>③</sup>福音书本身的创作宗旨就既非耶稣生平传记，更不是系统的文学作品，而是新兴的（教派）组织有意识地拣选材料以通传“福音”（意识形态）的宣言书。<sup>④</sup>在明确这一前提后，我们来对上述神学论争引起的经文变动进行具体考察。

嗣子说的主要代表是伊便尼派（Ebionite）。这是一个主要由犹太人基督徒组成的团体，他们仍然保留着犹太教尊奉耶和華独一神的信

---

<sup>①</sup> 有学者提出，在最早期阶段是否存在某种接近“正统”的思想？但这种观点遭到反驳：《约翰二书》《约翰三书》成书时，“道成肉身”观念已经在部分教会中得到确立。有关基督教派“正统”的观念史研究可以参考Walter Bauer,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1; James D.N. Dun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Press), 1977。

<sup>②</sup> Larry W. Hurtado and Chris Keith,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s.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69.

<sup>③</sup> 尤其在伊格尔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参见前文所引伊格尔顿：《耶稣基督：福音书导论》。

<sup>④</sup> 参见E. F.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131; C. I. Scofield, ed., *New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987.

条，认为耶稣不是神，只是上帝收养的“嗣子”，从而仅是一个真实的人。嗣子说的反对者强调耶稣的神性，以《马可福音》第1章40至44节耶稣治愈麻风病人的故事为例，可以发现基督教正统出于反嗣子说引起的文本变动。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可1：40-44）

通过比较现有最古老的希腊文伯撒抄本（Codex Bezae）、《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该处文本，可以发现此处的“耶稣动了慈心（SPLANGNISTHEIS）”在伯撒抄本中竟然是耶稣“动了怒（ORGISTHEIS）”。<sup>①</sup>更加惊人的是，马太和路加在几乎逐字引用马可这一节材料的情况下，竟不约而同地对耶稣SPLANGNISTHEIS还是ORGISTHEIS做了省略！

考察《马可福音》的文脉结构与创作背景后，埃尔曼认为“愤怒的耶稣”应该是马可写作的原文，马可笔下的耶稣是一个坚决维护属灵权威的形象，而耶稣动怒的原因恰恰在于麻风病人在请求耶稣治疗时措辞不当：“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既有意愿更有能力使麻风病人洁净，但这种试探性的口吻引起耶稣反感。但反嗣子说者认为原文的耶稣“动了怒”具有的人性色彩过浓，因此在抄写这段经

---

<sup>①</sup> Leslie Howsam and Scott McLaren, *Producing the Tex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r Editions of the Bible*, 149.

文的时候将SPLANGNISTHEIS私自改成了ORGISTHEIS。<sup>①</sup>

幻影说的支持者中以马吉安最为著名。这位哲学家教师是第一位有意识地进行圣经正典化的基督徒，有学者认为马吉安正典加速了福音书正典化的进程。<sup>②</sup>马吉安深受使徒保罗影响，认为保罗的真意在于区分律法和福音，而耶稣是不同于耶和華上帝的另一位神，具有完全的神性，耶稣的流血和死亡只是表面上的人性“幻影”而已。

幻影论否定耶稣人性的观点遭到教父特尔图良、爱任纽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耶稣的人性是完全的和不容质疑的。耶稣作为大卫王的后裔，且从童贞女体内孕出，以痛苦的流血和牺牲进行救赎，他的神性和人性是不能分割的，<sup>③</sup>如果他的人性是“幻影”，那么基督拯救行为本身的伟大意义就会遭到削弱。因此，强调耶稣真实的人性非常重要，这一点以《路加福音》中耶稣设立圣餐的经文最为典型：

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22:17-20）

在许多古代抄本中，不存在“为你们舍的……”这句话。<sup>①</sup>那么如

---

<sup>①</sup> 详参埃尔曼：《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第130-136页，亦见于Justo L. González, *Essential Theological Terms*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137-139。

<sup>②</sup> K. G. Ku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Press, 1975), 487.

<sup>③</sup> Michael Slusser, “The Heart of Irenaeus's Theology in Scripture,” in *Irenaeus: Life, Scripture, Legacy*, eds. Paul Foster and Sara Parivi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2), 135-139.

何证明这是后来加进去的，用意又是什么呢？“为你们舍的……”具有明确的行为意义，即申明了耶稣以血肉设圣餐的真实性。需要注意的是，路加笔下的耶稣血肉并非拯救的赎价，耶稣作为无罪之人受难的“行为”才是真正促使人们悔改的原因，只有人忏悔并转向上帝，才能得到救赎。由此可见，反幻影论者强调耶稣完全人性的目的在于捍卫耶稣受难的行为意义，如果耶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那么他就没有人的真实感受，从而耶稣作为无罪之人受难的行为也就失去了救赎的价值。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反幻影说者才在原文的基础上增添“为你们舍的……”

分离说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是信守诺斯替主义的基督徒。他们承认耶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但认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之间是互相分离的，神性的基督只是暂时栖居在人性的耶稣体内，随着耶稣死亡的临近，神性就彻底离开了他。因此耶稣才会在临死之前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太27:46）这句话被认为是福音书中令人颇为费解之处，诺斯替主义者从字面意义来解释“离弃”的含义，认为这是神性离开耶稣身体的明证。<sup>②</sup>而在诺斯替文献《腓力福音》中，在这句话之后还有一句：“〈上主〉在十字架上说了这些（话）。因为他〈是〉在那儿被分别出来。”（《腓力福音》72a）<sup>③</sup>由于“离弃”或“分别”的字眼极易被诺斯替主义者利用，有些抄本就将该词改为“嘲笑”，试图规避诺斯替式的解释。然而，从目前流行的版本来看，反诺斯替主义者的改动似乎并不足够成功，因为此段异文依然保持着上帝“离弃”耶稣的原貌。<sup>①</sup>这恰恰反映出一种神学上

<sup>①</sup> Bruce R. Metzger, *Manuscripts of the Greek Bible: An Introduction to Pal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72.

<sup>②</sup> David Brakke, *The Gnostics: Myth, Ritual, and Diversity in Early Christia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3.

<sup>③</sup> 黄根春编：《基督教典外文献——新约篇》（第二册），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75页。[*Christian Extra-Canonical Document – New Testament II*, ed. Eric K. C. Wong (Hongkong: Chinese Literature Council Ltd., 2001), 75.]

的难解之谜：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之间到底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延续到了机械复制时代的文本生产之中。

### 三、机械复制时代的文本变动

机械复制时代福音书文本的生成特征可以用16世纪第一本希腊文新约圣经出版的例子加以说明。伊拉斯谟是首位编辑出版希腊文新约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在新约的文本发展史上，伊拉斯谟的新约版本成为随后三百多年风行西欧的希腊文标准版本，著名的英王詹姆士钦定版圣经就是以之作为翻译底本的。

本雅明曾精确指出：“在文献领域中造成巨大变化的是印刷，即对文字的机械复制”<sup>②</sup>，而出版和印刷在文本生产中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伊拉斯谟的新约出版于1515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本印刷的希腊文新约。在此之前的1514年，西班牙枢机主教西麦内斯（Ximenez de Cisneros）就率先印刷了《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然而由于多种条件限制，该版本直到1522年才得以正式出版。在《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印刷之后，伊拉斯谟及其出版商约翰·弗罗本为了赢得出版首部希腊文新约的殊荣，强行加快出版进度，在没有充分搜集和参照最好抄本的情况下便匆匆开始了编辑工作，甚至直接从拉丁文回译希腊文，以弥补希腊文《启示录》抄本的缺漏部分。<sup>③</sup>伊拉斯谟为了完成出版任务而仓促赶制的“急就章”之作自然有许多不足之处。<sup>④</sup>

除此之外，伊拉斯谟的新约版本还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文本片段，

---

<sup>①</sup> Brakke, *The Gnostics*, 191.

<sup>②</sup>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第5-6页。[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rans. WANG Caiyong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01), 5-6.]

<sup>③</sup> Jacob van Bruggen, *The Ancient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Winnipeg, Man.: Premier, 1976), 53-54.]

<sup>④</sup> 例如上文提到的《马可福音》第16章的最后12节原本是没有的，却由于伊拉斯谟选用的福音书抄本是12世纪的产物，竟然将这一结尾包含在内了。

即《约翰一书》第5章7至8节：“在天上作证的有三：父、道及圣灵，这三样都归于一。在地上作证的有三：就是圣灵、水及血，这三样都归于一。”这一段对于教会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它是三位一体教义的直接依据。<sup>①</sup>但是，伊拉斯谟的新约版本中恰恰缺失了这一段，原因在于其使用的抄本中关于此段的原文是：“作见证的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都归于一。”<sup>②</sup>

伊拉斯谟“忠实”地按照该抄本出版了首版新约，但他的做法触怒了教会，因为缺乏“父、道、圣灵”的直接经文证据，这对于基督教会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面对各方的攻击和压力，伊拉斯谟同意在再版新约中加上该节经文，但前提是反对者必须拿出含有这节经文的希腊文抄本。果然，一份含有这节经文的古代抄本在16世纪出现了（确切地说是伪造出来了），各方终于各偿所愿，矛盾得以平息。

伊拉斯谟版新约圣经是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15世纪，古腾堡发明印刷机，使得文本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在此之前，文本的生产只能依靠抄写人员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手工复制，不仅速度极慢，而且造价昂贵。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高效的书籍生产和低廉的复制成本促使信息的主要传播方式从口头传播变为书面传播，专业的出版机构亦应运而生，分工不断细化，主要表现就是印刷和出版流程的分离。<sup>③</sup>伊拉斯谟的“首版”希腊文新约出现上述问题发生在机械复制的时代，也正与这一文本生产机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说明文本生产的意识形态变动不仅存在于手工复制时代，也存在于机械复制的时代。<sup>④</sup>虽然复制技术不同使得文本生产的具体结

<sup>①</sup> Schniedewind,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53.

<sup>②</sup> P. C. Allen, *The Age of Erasmus*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3), 127.

<sup>③</sup> John Man, *Gutenberg: 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02), 19.



果不同，但都使意识形态对文本生产的干预凸显出来。<sup>②</sup>

约翰书信的经文变动也写照了早期基督教时期最大的一个神学论题：耶稣的神人二性及其相互关系。耶稣是人，还是神？若二者皆是，耶稣的神人二性以何种方式存于一体？笔者相信，讨论神人二性的基督论之所以重要，原因恰恰在于这绝非一个单纯的神学问题。或者，在那个时代神学与现实政治本就是不可分割的。<sup>③</sup>进一步来说，如果这纯粹是一个神学问题而无关意识形态，那么其影响力最多发生在早期基督教与犹太人之间，根本不会引起罗马当局的关注。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遭遇的戏剧性变化，正说明了这一发生在“神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

那么，大公教会的正统派是如何处理耶稣的神人二性问题呢？公元451年，查尔斯顿大公会议对基督的神人二性予以界定：耶稣“是唯一的基督，是子，是父，又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淆且保持不变，不存在分裂和隔离。二性的联结不会破坏二者之间各自拥有的特征；神性和人性会合在一个位格之内，且各自特点得以保存”。<sup>④</sup>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在位格中建立彼此平等的对话关系，两者既互动又合一，互动既不会模糊各位格的个体性，也没有割裂位格间的关系，不仅在“彼此之中存有”，而且从对方中获取自身的存在。这种位格式的平等关系既是对外部等级制的挑战和反驳，又是协调教会矛盾达到平衡状态的最佳解决方案。<sup>⑤</sup>由此看来，基督教正统的胜出并非偶然，它与嗣子说、幻影说、分离说等异端论辩的真正目的，在于坚守一种对话式的理想神人关系。因此，耶稣的神人二性（需要）彼此平

---

<sup>①</sup> Brian Elliott, *Benjamin for Architects* (London: Routledge, 2011), 158.]

<sup>②</sup> Schniedewind,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65.

<sup>③</sup> Richard A. Horsley, *Sociology and the Jesus Move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94), 8.

<sup>④</sup>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rev.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78), 340.

<sup>⑤</sup> Colin J. D. Greene, *Christology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Marking Out the Horiz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2004), 135-137.

等且不可化约、不可转化，更不可缺失其一。

综上，如果将文本生产理解为一种意义生成的机制，可以发现福音书文本的动态演变是文本意义不断生成和增殖的过程。<sup>①</sup>因而对于立足未稳的早期教会系统来说，调和或消解经文内部的矛盾使之符合所谓“正统”，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从时间上来看，这一合理化经文的过程从现存最早的基督教作品《帖撒罗尼迦前书》（约公元49年）出现，至17世纪机械印刷技术和国家机器的共同推动使得经文形态真正稳定下来，其间包括了正典化过程和传抄过程，持续大约1600年。笔者通过对手工复制时代和机械复制时代福音书文本生产机制的分析，结合社会历史语境和具体文本变动，提炼出一条贯穿福音书文本生产的重要线索——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对话存在是文本生产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渗入的结果，<sup>②</sup>意在助益于对富含多重意蕴的福音书文本进行适切理解。

---

<sup>①</sup> 据不完全统计，仅《新约》中的异文数量就达三、四十万之巨，比《新约》本身的字数还多。参见埃尔曼：《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第80-81页。埃尔曼同时也提到这些异文大部分都是无关紧要的。经文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基督教派的“多样性”，反过来基督教派的多样性又加剧了更多文本的出现，教会历史学家马丁·马蒂（Martin Marty）曾感叹道：“我们所见的基督教有多种形式，差不多包括25000个教派，而这些教派大多在中途便濒临分裂，于是我们就有了50000个实体。”基督教的多样性已经成为学术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信仰与本土文化结合的必然结果，它体现了基督教传统的丰富程度，表达了多样性与同一性的结合，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的多样性是长期冲突、磨合、调试的代价，其间不乏“正统之争”的激烈角逐。见Martin Marty, “Cross-Multicultures in the Crossfire: the Humanities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in the Crossfire*, eds. David A. Hoekem and Bobby Fong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15。引自杨慧林：《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教问题论说的六个问题领域》，第13页。

<sup>②</sup> 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批评学者哥特瓦尔德直截了当地指出：“圣经文本蕴含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见Norman K. Gottwald, *The Tribes of Yahweh: A Sociology of the Religion of Liberated Israel, 1250-1050 B. C. E.* (New York: Orbis, 1979), 47。

## 结 语

耶稣基督形象的这种对话特质是通过福音书文本的生产而逐步形成的。无论是神性还是人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生产过程的结果。杨慧林教授犀利地指出：“如果去追寻正典形成的历史，我们分明会感到几乎每一种阐释都与树立或反抗一定的权威相关联。”<sup>①</sup> 神人二性在福音书文本中的对话式存在是不同意识形态进行文本生产的结果。不过，事实上从近现代社会的主流认知来讲，耶稣或者说福音书文本的天国指向与尘世指向之间很显然不是平等对话关系。对耶稣基督的认知首先得是神，其次才（可能）是真实的人。这种现代认知的形成实际上是阐释行为造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消解耶稣人性中的政治意味，以符合罗马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要达到此目的，强化耶稣的神性而淡化其人性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

<sup>①</sup> 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YANG Huilin, *Ji du jiao de wen hua di se yu yan shen*(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24.]

##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献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llen, P. C. *The Age of Erasmus*.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3.
- Bauer, Walter. *Orthodoxy and heresy in earliest Christianity*.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71.
- Belo, Fernando. *A Materialist Reading of the Gospel of Mark*. Translated by Matthew J. O'Connell. Maryknoll: Orbis, 1981.
- Benjamin, Walter. *Reflections: Essays Apb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Edited by Peter Demetz. New York: Harcourt Jovanovich, 1986.
- Brakke, David. *The Gnostics: Myth, Ritual, and Diversity in Early Christian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ruce, F. F. *Israel and the Nations*.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 Bruggen, Jacob van. *The Ancient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Winnipeg, Man.: Premier, 1976.
- Dunn, James D. N. *Un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SCM Press, 1977.
- \_\_\_\_\_. *Christology in the Making: A New Testam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Incarnati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880.
- Eagleton, Terry.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erso, 1991.
- Ehrman, Bart D. *Lost Christianities: Battles for Scripture and the Faiths We Never Kn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Elliott, Brian. *Benjamin for Architects*. London: Routledge, 2011.
- González, Justo L. *Essential Theological Terms*.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 Gottwald, Norman K. *The Tribes of Yahweh: A Sociology of the Religion of Liberated Israel, 1250-1050 B. C. E*. New York: Orbis, 1979.
- Greene, Colin J. D. *Christology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Marking Out the Horiz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2004.
- Harrison, E. F.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 Hills, Edward F. *The King James Version Defended*. The Christian Research Press, 1984.
- Horsley, Richard A., and Jonathan A. Draper. *Whoever Hears You Hears Me: Prophets, Performance, and Tradition in Q*.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9.
- \_\_\_\_\_. *Sociology and the Jesus Movement*. New York: Continuum, 1994.
- Howsam, Leslie, and Scott McLaren. "Producing the Tex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r Editions of the Bible."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ited by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Hurtado, Larry W., and Chris Keith.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s."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ited by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63-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Kelly, J. N. D.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78.
- Macherey, Pierre.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Man, John. *Gutenberg: How One Man Remade the World with Word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2002.
- Marty, Martin. "Cross-Multicultures in the Crossfire: the Humanities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 in the Crossfire*. Edited by David A. Hoekem and Bobby Fong, 15-27.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Mekenzie, Steven L. and Stephen R. Haynes, eds. *To Each its Own Meaning*. Louisville,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9.
- Metzger, Bruce M. *Manuscripts of the Greek Bible: An Introduction to Pal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_\_\_\_\_. *A Textual Commentary on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New York: United Bible Society, 1994.
- Pippin, Tina. "Ideology, Ideological Criticism, and the Bible." *Currents in Research*, no. 4 (1996): 51-78.
- Reed, Walter L. *Dialogues of the Wor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Bakht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chniedewind, William M. "Writing and Book Production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600*. Edited by James Carleton Paget and Joachim Schap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cofield, C. I., ed. *New Scofield Reference Bib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lusser, Michael. "The Heart of Irenaeus's Theology in Scripture." In *Irenaeus: Life, Scripture, Legacy*. Edited by Paul Foster and Sara Parivi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2.
- Tenney, M. C. *New Testament Times*. Michigan: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续)》,李迅译,载《当代电影》,1987年4期,第31-43页。[Althusser, Louis.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Translate by LI Xun. *Contemporary Cinema*, no. 4(1987): 31-43.]
-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Althusser, Louis. *Du zi ben lun* (Lire Le Capital). Translate by LI Qiqing and FENG Wengua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1.]
-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Althusser, Louis.

- Bao wei Ma ke si* (Pour Marx). Translate by GU Liang. Beijing: The Commerical Press, 2016.]
-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Benjamin, Walter.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Translate by WANG Caiyong.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01.]
- 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Brecht, Bertolt. *Bu lai xi te lun xi ju* (Brecht on Theatre). Translate by DING Yangzhong. Beijing: China Theatre Press, 1990.]
- 陈润棠：《新约背景》，香港：圣道出版社，1974年。[CHEN Runtang. *Xin yue bei jing*. Hongkong: Shengdao Publisher, 1974.]
- 威尔·杜兰：《凯撒与基督》，载《世界文明史》第3卷，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Durant, Will. “Caesar and Christ.” In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vol. 3. Translate by Taiwan Lion Culture Company. Beijing: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1999.]
-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Eagleton, Terry. *Marx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e by WEN Bao.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0.]
- 伊格尔顿：《马歇雷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戴侃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33-39页。[Eagleton, Terry. “Macherey an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ranslate by DAI Kan. *Social Sciences Abroad*, no.1(1983):33-39.]
- 伊格尔顿：《耶稣基督：福音书导论》，赵文琼译，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10年春，第49-77页。[Eagleton, Terry. “Introduction to Jesus Christ: The Gospels.” Translate by ZHAO Wenqion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23(2010):49-77.]
- 巴特·埃尔曼：《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黄恩邻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Ehrman, Bart D. *Misquoting Jesus: The Story Behind Who Changed the Bible and Why*. Translate by HUANG Enli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Engels, Friedrich. “The History of Early Christianity.”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5.]
- 林鸿信：《第一位使徒：抹大拉的玛利亚》，载《圣经文学研究》第2辑·2008年，第217-247页。[LIN Hong-Hsin. “The First Apostle: Mary Magdalen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2(2008): 217-247.]
- 刘光耀：《四福音书解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LIU Guangyao. *Si fu yin shu jie du* (Introducton to Gospels).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04.]

-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Lukács, Georg. *Guan yu she hui cun zai de ben ti lun*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 vol. 2. Translate by BAI Xikun.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1993.]
-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Marcuse, Herbert. *The Dimension of Aesthetic*. Translate by LI Xiaob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Marx, Karl.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Manuscript of 1844.”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Marx, Karl. “The German Ideology.” In *Marx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Marx, Karl. “Introduction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arx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麦兹格：《新约正典的起源、发展和意义》，刘平、曹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Metzger, B. M.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Translate by LIU Ping and CAO Jing.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8.]
- 莫尔特曼：《三一与上帝国：论上帝的教义》，周伟驰译，香港：道风书社，2007年。[Moltmann, Jurgen. *Trinität und Reich Gottes: zur Gotteslehre*. Translate by ZHOU Weichi. Hongkong: Logos and Pneuma Press, 2007.]
- 王学晟：《从小教派到大教会的转变：耶稣运动的框架整合》，载《圣经文学研究》2017年春，第48-64页。[WANG Xuesheng Nathanael. “From Sect to Church: The Frame Aligenment of Jesus Movement.”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14(2017):48-64.]
- 黄根春：《天国概念的演变：从耶稣到保罗》，载《圣经文学研究》2010年，第200-216页。[Wong, Eric K. C. “Tian guo gai de yan bian: cong ye su dao bao luo.”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4(2010):200-216.]
- 黄根春编：《基督教典外文献——新约篇》第2册，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1年。[Wong, Eric K. C., ed. *Christian Extra-Canonical Document—New Testament II*. Hongkong: Chinese Literature Council Ltd., 2001.]
- 许志伟：《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XU Zhiwei. *Ji du jiao shen xue si xiang dao lu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1.]
- 杨慧林：《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教论说的六个问题领域》，载《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第11-16页。[YANG Huilin. “Six Problems in the Religious Discourse of Western Marxism.” *The Religious Cultures of the World*, no. 1(2012): 11-16.]

- 杨慧林：《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YANG Huilin. *Ji du jiao de di se yu wen hua yan shen*. 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赵敦华：《上帝之城里的哲学》，载《基督教文化学刊》2010年春，第100-107页。[ZHAO Dunhua. "Philosophy in *The City of Go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vol. 23(2010):100-107.]
- 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ZHANG Yibing. *Wen ti shi, zheng hou yue du yu yi shi xing ta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Translation Press, 2003.]
- 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Žižek, Slavoj. *Map Ideology*. Translate by FANG Jie.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